

DANG JIN
QI NU ZI

當今奇女子

李士非 著



当 今 奇 女 子

李士非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北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 插页 171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7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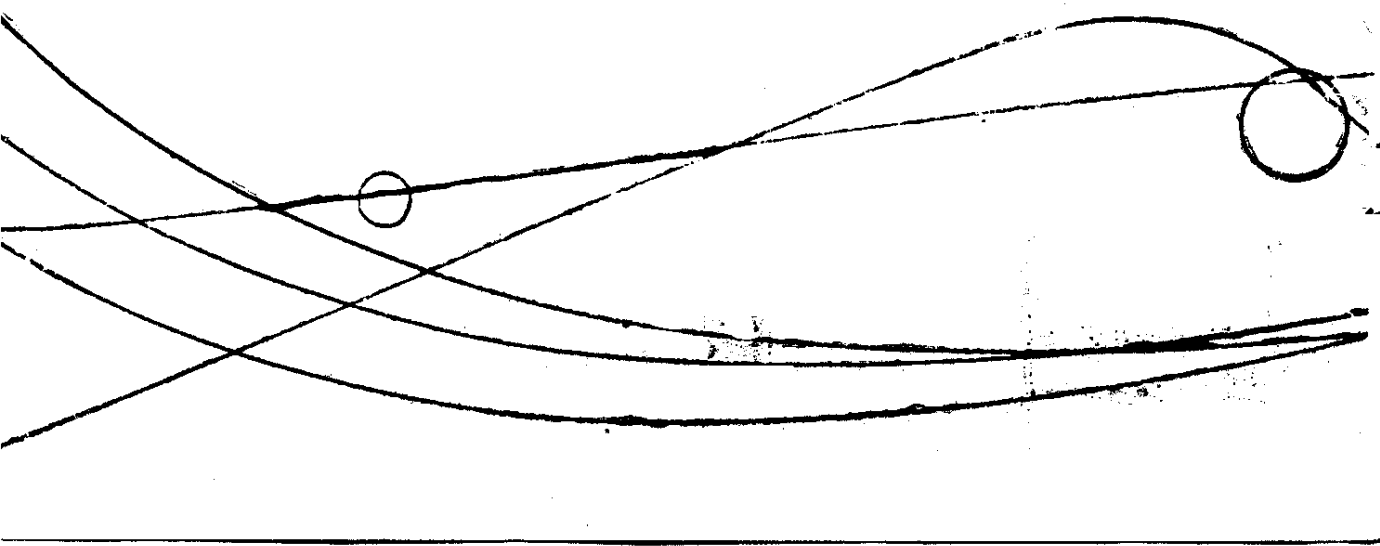
*

ISBN 7—5059—0475—2

I·301 定价: 2.20元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内 容 提 要

本书荟萃四篇报告文学、三篇小说、五篇散文。其中《热血男儿》以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为主，描写一群致力于改革的热血男儿，同时还提出许多涉及改革的社会问题，作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曾获优秀报告文学奖。《当今奇女子》多侧面、全方位地刻画一位女教师不同于常人的奇异性格和浪漫多彩的生活，作品极富传奇色彩，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作品直面人生，切近现实。

身边的，但又是超越了 想象的（序）

祖 慰

人的艺术行为充满着“背反律”。后现代派的人却宣言“越是原始的，越是现代的。”在这什么都讲多元化的年头，新潮作家们出集子却喜欢专一化。不是小说专集，就是散文专集；不是诗歌专辑，就是评论专著。偏偏是“天然去雕饰”的非新潮作家李士非却编了本多元化的集子——有报告文学，有小说，有散文，甚至还有为友人的专集写的序言！

有位和尚写过一副名联，上联曰：“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艺术家全是顿悟这佛理的。这集子的编法，就是佛理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说，理念的感性显现为美。

常常根据“文如其人”由文推及人，不妨来个反向思维，由人言文。

士非，名字前有一长串定语：花城出版社总编兼《花城》主编，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得主之一。他全都不以为意，不把这些作为社会角

色的依据。对他来讲，最确切地给他定性的定语就是巴金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真实地爱和真实地恨。无论他待人接物，还是命笔疾书；无论处于逆境，还是委以重任：他都能真实地爱和真实地恨。

《热血男儿》，平铺直叙，白描，找不到一个高级形容词，没有“够劲”的恢宏的场面，没有福克纳式的颠倒时空，一股“生活流”从你身边流过，却载来一个超出人们想象力的人物——袁庚。不是写了袁庚的丰功伟绩超出人们的想象力，而是写出袁庚在这革故鼎新的怀孕时代新产儿的年月他“想什么”和“怎么想”，作者蘸着最浓缩的爱把这些写了出来，于是，使人惊叹。作者真实地爱改革开放，决定了他选择写袁庚这个真实地为改革奉献全部热血的人。如托尔斯泰所说，作者把自己的爱和恨的体验表达出来，让读者也体验一遍，构造了艺术活动。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时，预选作品中就有两篇写袁庚的。为什么评委热情选了士非这一篇，而且排名次很前？可能是士非以溶在“生活流”的每滴水中的真实的爱而取胜。

《昭雪之后》，不仅有着真实的浓浓的爱，还有真实的浓浓的恨。难怪这篇文章发表之时，不仅惊动省委，还形成了民间的强劲心理冲击波，社会的共鸣箱震荡，何止“绕梁三日”！

看他写的一篇小序《绿茵漫步》，本该是扳着面孔写的理性文字，可是，读来让人心颤！

古人说，为人要老实，为文要狡滑。可他违拗古训，为人真实，为文也真实。这个“非法法也”，使他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动人力量。

请看他的《没见过面的朋友》，记述了一个罕闻的“文学反馈”。他写了一篇散文《不幸中断的回声》，竟然引来了一位崇高而充满爱心的遥远的朋友！哪位作家享受过如此春天般的水晶般的厚爱？

士非的为人为文，使他成为作家们的最可倾诉最可依托的朋友。

如果士非的作品只是以情动人，充其量不过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佳作，为什么它也能征服现代的年轻的高智能者？

正在全世界兴起一个文学与新闻杂交的“新新闻主义”。当今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这股潮流将必然领风骚于未来。其美学根据：如今社会的发展太快，快到了远远超出小说家的想象力。例如太空中的飞行，例如全球性的“经济战争”，小说家不能凭想象力写出“高于生活”的作品，因为你还没有写出来，描写对象又变化到另一个全新的数量级上去了。只有新新闻主义才能及时准确反映这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当今奇女子》写了一位不见经传的在我们身边的中学教员。但这位老师的人格三要素（道德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太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了！她是中国大改革时代冒出来的人物，不仅中国“史无前例”，外国也不会有。小说家不可能“典型化”出这样的人物。只有用新新闻主义文体来写，才是最佳的最及时的表达。《不能安静的张静》不也是变化太快的时代中冒出来的超人们想象力的人物吗？

更有新新闻主义文风的是《柯县长与木村先生》。文中

的两个人物是化名的真人。主要事件也是真的。这是写开放后的中国民族怎么对待有民族宿仇的外国人的故事。柯县长与木村先生，这两个人物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身边常遇的。但是，这两个人物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在人际交往中的复杂情感却是超出想象的。柯县长的童年经历（日军进犯前夕读都德的《最后一课》，不愿学日语被罚吃粉笔头等情节和细节）却是作者自己的。新新闻主义不同于我国的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可以把别人身上发生的真事，移到主人公身上来。不拘泥于被写人物的真实，它求的是社会的大真实，或叫综合真实。小说的典型化也是求综合真实，但是，情节和细节可以是完全虚构的。

未来学家们预言，在信息“爆炸”的信息社会，人们尤为关心周围的信息。用美学术语来表述，那就是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更喜欢作近距离的审美观照。这就是新新闻主义方兴未艾的原因，也是我对士非这本集子作近距离审美观照而得到的诱发我美感冲动的审美信息——身边的，真实的，动情的，综合的，超越想象力的，为人和为文完全同构的……

1987、4、4于广州



目次

1	身边的，但又是超越 了想象的(序)
1	热血男儿
59	招商集团
105	昭雪之后
140	当今奇女子
170	柯县长与木村先生
182	国手
191	担心
211	三回故乡
226	不幸中断的回声
236	不能安静的张静
244	没见过面的朋友
247	绿茵漫步

热血男儿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国际歌》

一、能见到袁庚吗？

在改革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蛇口工业区和它的领导人袁庚，名扬国内外，越来越引人注目。

但是，我接受写袁庚的任务，未免有点儿冒险。我从来没见过他，手头也没有积累多少关于他的资料，而且听说采访他很困难：他是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人们因此亲切地称他为袁董），大部分时间在香港，每到蛇口，都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时间接受采访。但是，过去几次陪外地作家到蛇口参观，听过介绍，看过录像，袁庚和蛇口已经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就可以到蛇口来，

这个“诱惑”是不可抗拒的。“能见到袁庚吗？”“即使见不到袁庚也要写！”所谓“冒险”，无非是写不出或写不好，个人面子不好看罢了，比起袁庚和他的朋友们从事改革所冒的风险，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仅仅为了呼吸一下蛇口的改革空气，到这里呆一些日子也是值得的。

“如果你只能呆很短的时间，我劝你趁早打退堂鼓，不要重蹈某电影编剧的覆辙。”一位好心的朋友这样劝我。

谢谢朋友的好意。开弓没有回头箭，退堂鼓不好打的。

二、夜访梁宪

在蛇口采访真不易。我七月中旬到蛇口，袁庚出国去了，说是七月底或八月初才能回来；最了解他的一个人，东江纵队时期就和他一起工作、现任蛇口工业区顾问的许智明，到澳大利亚探亲去了，归期未定。这里的工作节奏与内地大不相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白天工作紧张，找人谈话很难，晚上访问也要事先约定，因为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会是在晚上开的。一天在办公大楼电梯口碰上袁庚的儿子袁中印，深圳特区报记者陈宜浩同志向他介绍了我的来意，他马上说：“有什么好写的？这么多人写过了，要出书收集一下就行了嘛。”我想这大概是受了乃父的影响，不大欢迎采访。“慢慢来吧，我一定要找你的。”我心里说。

多蒙在这儿挂职当办公室副主任的珠影编剧、女作家黄虹坚同志帮忙，约定了一个晚上九点钟去访问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梁宪。我和黄虹坚、陈宜浩三人，穿过海滨花园，沐着海风，经过灯光璀璨的“海上世界”明华轮旁边，漫步走向

梁宪的住处。早已听说，他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是梁宗岱教授的高足，对法国文学很有研究。果然，一见之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艺术气质很重的人。

他掏出港币，买了几罐冰冻可口可乐待客，然后和我们谈笑风生。

“你们是文人，我是商人。我是弃文从商。我老婆也是文人，她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我对她说：你讲的唐诗宋词是很美的，但是解决不了老百姓的肚子问题。中国象你们这样的文人太多，象我这样的商人太少了。”他突然对着黄虹坚说了一句英语：“I will change you into a business woman.”我听了莫名其妙，黄虹坚一时也没反应过来，陈宜浩翻译说：“他说要把你改造成一个女商人。”我们都开心地笑起来。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老百姓正在饿肚子，大概没有哪个单位需要一个研究法国文学的尖子，他就到了交通部。一九七九年七月派到香港招商局工作，比袁庚晚半年多一点。袁庚很器重他，有人说他是袁庚的“智囊人物”。

“我去香港的时候，老婆说：最怕你没骨气，没骨气趁早离婚。当然这点骨气是有的，外派干部只要有一点热血，就不是追求几大件，而是感到抬不起头来！”

“刚到香港，每天看电视见偷渡青年戴着手铐，一串一串的，海上漂着偷渡者的尸体，我们不能忍受，啪一声把电视机关了。”

“我们国内搞不好，连一些在香港长大的外派干部的子女也瞧不起我们，心里真难受呀。所以，我很理解袁庚搞改革的心情。他说过：‘我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实现我入党时

期的初衷。’ ”

一番话说得我心情沉重起来。停了一会儿，梁宪又概括地说：

“我熟悉的人当中，有两个热血男儿，一个是我爱人的干爹刘任涛，一个就是袁庚！”

好一个“热血男儿”！这个词太恰当了，把这两个人并提太好了，我不禁怦然心动，觉得找到了通向袁庚的内心世界的最佳途径。

也真巧。比我年长二十岁的刘任涛，是我尊敬的长辈和忘年之交。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眼科专家，解放初期是上海劳动医院的院长，曾为刘伯承元帅安过义眼。后来因为写了电影剧本《为了和平》，不幸改行当了电影编剧，“文化大革命”中在珠影被诬为“历史反革命”，打断五条肋骨，投进监狱。在英德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期间，他看到一位农村妇女因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不顾自己的政治处境，不顾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决心用刮胡子刀片为患者动手术。好心人劝他：“万一失败，你就是阶级报复，就会重进监狱。”他不听，他终于成功了。“作为医生，我拯救了我的灵魂。”现在他年过古稀，立下遗嘱：死后把眼睛献给中山医学院眼库。然后为恢复和建立盲童学校而到处奔走呼吁……

刘任涛和袁庚，经历和事业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满腔热血、赤子之心和献身精神，是多么相似呵！我从熟悉的刘任涛想象不熟悉的袁庚，觉得对袁庚也开始熟悉起来了。

三、“冒险家”

刘任涛以专政对象的身份用刮胡子刀片为贫农妇女割白

内障，要冒风险；袁庚在蛇口进行改革，要冒更大的风险。两年之前，不是有人在报上写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经济特区吗！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今天的改革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胡耀邦同志视察蛇口工业区，袁庚在总书记面前披肝沥胆，和总书记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袁庚：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好下场。康有为、梁启超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结果六君子杀了头。孙中山也是搞改革的，也失败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胡耀邦：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被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我们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惟恐照顾不周。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我只怕交通部，怕顶头上司，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

所以，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我们这里想搞个改革试点，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

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有些领导一旦权在手，就有人自动送礼上门，如果头脑不清醒，不能自律，就会忘乎所以。还有些干部自己不懂又装懂，诸如此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我们想作这样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准备冒点风险。

胡耀邦：（点头）好！很好！

袁庚：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

胡耀邦：（高兴地站起来）我们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戏剧家关汉卿，在哪一出戏里我忘记了，讽刺官僚主义者，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堂上的鼓。有一段唱词说：

“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叮咚叮咚又叮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全场大笑）

党中央总书记和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心心相印，想到一块去了，这在蛇口的发展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选举产生了蛇口工业区新的管理委员会。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按期举行了对管委会的信任投票。是不是一定要搞信任投票？组干处处长虞德海说：“连我都有点犹豫。因为信任投票的结果是要兑现的，信任票不足半数就得下台。我想是不是搞个民意测验算了。但是袁董很坚决，一定要搞信任投票。”投票结果，管委会成员的信任票全部超过半数，袁庚的信任票最多。当天晚上，全部投票公开任人查阅，尽管有些票上的批评意见很

尖锐，如“某某能力低”、“某某不堪信任”之类，也不加掩饰。这和内地“民意测验”的结果往往成为“绝密材料”的做法，形成多么尖锐的对比！

这是蛇口工业区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

四、“那里不肯放，就辞职！”

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定期进行信任投票，这是袁庚深思熟虑的一项决定。他深深感到，不改革干部制度，不改变干部结构，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四化”也只是一句空话。

有的领导干部，居然问来访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客人：

“你们大学建多大的桥？”问来访的美国客人：“英国人讲英语，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还有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他到香港考察的收获：“思想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如此等等，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干部，怎能担当领导“四化”的重任！

蛇口还在“五通一平”、指挥部只有二十多个干部的时候，袁庚就开始考虑如何培育一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干部队伍。一九八一年，他排除阻力，毅然决定举办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从全国各地招收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用他的话说，“我是个冒险家，为了蛇口的改革，我从全国各地罗致了一批小冒险家。”

当时蛇口工业区还没有力量派出自己的招生人员，委托交通部下属的交通科学院情报所代为主持，在武汉举行了第一次考试。第一个走进考场的，是交通部长江航运科研所船体研究室工程师王潮梁。

王潮梁一九三八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九六〇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早在一九五八年，他就参考外国资料，在我国第一个开始研究飞翔船的气垫原理，并和同学们一道造出了样品，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上表演过。当时英国人对飞翔船的研究只比他们早半年。可是，在“大炼钢铁”比科学研究更受重视的年代，几个毛头小伙的研究只有夭折的份儿。他毕业后分配到某飞机工厂飞机设计室任产品主管设计员，那时生产要听驻厂军代表的，而军代表只相信苏联专家和苏联图纸。比如某种螺旋桨规定要用乌拉尔的木料，翻砂规定要用乌克兰的型砂，虽然中国有更好的木料和更好的型砂，也不准更改。初出茅庐的王潮梁憋了一肚子气，却毫无办法。岁月如流，王潮梁搞了十七年飞机设计，却看到我们的飞机工业比印度还落后；又研制了四年的飞翔船，却看不到一艘飞翔船下水，那种壮志难酬的痛苦折磨着他的雄心。有一次赴西德考察的机会，唯一的名额给了业务上根本不能与他相比的某部长的女儿。当他从报上看到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招生的广告时，他兴奋极了，“蛇口是凭本事干事业的地方，去！”立刻把广告剪下来，珍重地贴在本子上。

他第一个走进考场，第一个走出考场。笔试，面试，成绩优良。主持考试的情报所林鸿慈同志下了结论：是个人才，录取！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干部却是单位私有制。一个单位可以把一个或一批人才冷藏一辈子。

长江航运科研所不肯放人。